

明镜
评论

农民尊严感的实质是权益和公平

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就是在提升他们的尊严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搭建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

■朱四倍

我国首个《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在京发布了。《报告》显示，农民对贫富差距感受颇深，但暂时鲜有仇富心理，对未来比较乐观；农民对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国家大事不太关注，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此外，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下降，乡镇干部有疏远群众的趋势（11月29日《南方日报》）。

尊严感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尊严状况所持有的情感认知和理性判断，它是一种较全面、较稳定的心理定势。温家宝总理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

有尊严”，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农民尊严感继续下降意味着什么呢？

农民尊严问题实质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只有当社会秉着公平、公正和正义的原则运行，使农民充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生活得更

有尊严，才能真正使社会和谐。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人民的尊严感也不会太低。所以，农民的尊严感下降是他们所享受到的社会待遇及公共资源严重缺失的证明。

农民尽管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现实中，无视农民利益或者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的现象时有发生。近两年发生的数起农民集体下跪事件，既是农民投诉无门的被迫选择，也是农民尊严感匮乏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农民尊严感下降与他们缺少利益表达的手段和能力有关。由于缺乏相应的组织支持，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成本很高。即使有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但受制于各种因素，其利益问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

决。这又使大多数农民不得不选择忍耐和沉默。因此，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就是在提升他们的尊严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搭建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

可见，农民尊严感下降的实质是权益如何维护和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认真疏通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倾听农民的心理诉求和利益需求，既是政府做出科学决策的前提，也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只有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利，让农民有尊严地活着，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农村秩序的稳定。

达到历史最高的扶贫资金有多安全？

对于扶贫资金的去向,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因为,那些心怀贪念的人下手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吴杭民

记者28日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今年我国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明显加大,由上年的222.68亿元增加到270亿元,增幅达到21.25%,增量和增幅都达到历史最高(11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扶贫资金增量和增幅都达到历史最高,这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因为,扶贫开发是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使社会协调发展、进步,乃和谐社会之要义。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好事经常多磨,有的甚至还令人失望、气愤。就比如扶贫资金,国新办

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当前,我国在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中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制度,各级政府、中介机构、农户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开展多重博弈,甚至出现挤占和挪用扶贫资金的现象,致使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扶贫款在不少人眼里,是一块肥肥的“唐僧肉”,不少官员先后栽倒在扶贫资金上。去年,媒体披露过一个极其恶劣的案例:扶贫款拨付前就要求对方必须给30%的回扣作为“办公经费”,否则事情将很难办——安徽阜南县扶贫局原局

长王春平及两名副局长王本端、王修宏因此落马。

对于扶贫资金的去向,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因为,那些心怀贪念的人下手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关切地追问,达到历史最高的扶贫资金有多安全?

扶贫资金的安全问题同样应得到历史最高的重视和关切。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和程序,公开、透明是扶贫资金免于被“劫持”、“提留”的法宝,扶贫资金的用途,要及时公示,接受民众的监督;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胆敢对扶贫资金下“黑手”的官员,在量刑上要从重从严,惩前毖后,使得扶贫资金真正能一分不少地用在刀刃上。

“助人免责”需先分清责任

界定助人行为的双方责任,应当遵循两个主要原则:一是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二是“疑罪从无”。

■张玉胜

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条例》规定,救助

人提供救助行为在原则上将被免责。同时规定,被救助

人隐瞒歪曲真相须赔礼道歉,涉嫌诈骗或犯罪的,将由相应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1月29日《广州日报》)。

在人们对“好人难当、好事难为”的社会怪相多有诟病的背景下,像深圳这样由地方政府专门就助人行为制定保护法规,这种全国首例很有意义。从征求意见稿来看,相关规定包括对助人行为的社会鼓励、对助人行为的免责保护和对助人者给予救济帮助等制度,因此,该《条例》又被称为“好人免责法”。

但就“好人免责”而言,只有分清了助人者和受助者在助人行为发生前后应负的公民责任,“好人免责”才会具备前提和内容。“做好事反被诬”之所以纠结不清,关键就在于真相难觅、责任难分。因此,如

实划清当事人的责任界限,是实施对“好人”免责和对“恶人”问责的必要条件。

鉴于见义勇为语境的复杂性和国人思维的

多元性,笔者以为,界定助人行为的双方责任,应当遵循两个主要原则:

一是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原则。在正常情况下,助人行为是在事发突然的情况下实施的救急行动,助人者不可能在事前就有自证清白的心理预期;而受助者表达指认意愿和诉至法院维权,应当有区别责任过失的基本判断。让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谁主张谁举证”司法原则。

二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真相不明、查无证据、是非混淆、良莠难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大量“做好事反被诬”的冤案,都源自当事法官本能地同情弱者(伤者)和“各打五十大板”的主观臆断。“疑罪从无”作为避免冤假错案的重要判案原则,应当在倡导见义勇为风尚中得以充分体现。对于救助行为引发的争讼,只要被救助者或者司法机关不能证明救助

人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就应认定救助人对救助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应当成



赵顺清 画

为司法底线。

当然,一个传统美德不得不在法律的庇佑下得以传承,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尴尬之事。因此,在充分肯定深圳市立法保护救助行为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莫忘对道德诚信的力挺,比如,奖赏好心人见义勇为,鼓励见证人挺身而出。

别让消费者噤若寒蝉

单个消费者的负面表达,只代表一种声音,譬如一叶落而知秋,但秋的到来绝不是某一片树叶造成的。

■吕俊

最近,隔着太平洋上演了两场消费者唱主角的大戏。一场发生在美国,某“月光族”女孩为反对美国银行收取借记卡5元月费,带着摄像机拍下到银行终止账户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号召人们一起拒绝被宰的命运,很快获得30万人签名支持,最终美国银行被迫收回成命。另一出发生在中国,“老罗”在西门子总部门口挥动大锤砸烂了有质量问题的西门子冰箱,他还表示以后将不定期开砸。两件事给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消费者的言语,而是他们的行为。透过行为传递出来的信息简单而有力——消费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纠纷有这样一条司法解释:“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从文义看,消费者滥用批评权应仅指那些明知自己所述不是事实,仍然恶意而为的情形,而且如引发诉讼,消费者是否恶意诽谤应当由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然而,在过去十几年里,各地法院的判决并非全然如此。消费者常常是贴一张大字报、举一块黑板、拉一个横幅讲述自己的维权过程,或者到网上发一帖谈谈自己的购物体验,都可能惹祸上身。表面上,被捆绑起来的“上帝”仍然享有法律上的批评权,但他的批评却不能扩大化,不能让公众听到。消费者维权成了“讨”说法,一个“讨”字,生动刻画出现阶段消费者的实际权利多么可怜。

出现这种困局,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理清企业商誉和消费者批评权之间的关系。单个消费者的负面表达,只代表一种声音。只有这些声音汇集起来,才会构成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品的市场评价。譬如一叶落而知秋,但一片树叶不是秋的全部,而且秋的到来也绝不是某一片树叶造成的。然而,司法上追究个别消费者所谓过度维权的案例中有一种倾向,往往把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下降认做个别消费者批评所致。这种判决多了,消费者会噤若寒蝉。

网络时代里,微博发布,同气连枝,每个人的思想可以轻而易举发布出去。司法上不应当再把炒作分为正当炒作和非正当炒作,更不应在将炒作一律视为一种不正当的批评。所谓商誉不仅属于商家,同时更具有社会性。通过压制消费者对

企业或者产品的负面评价,即使打造出100%好评也是虚假的。保护个别消费者的表达权,不仅关系着更多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会促进企业重塑形象。